

水浒研究与欣赏

第四辑

浙江水浒研究会编

水浒研究与欣赏

第四辑

浙江水浒研究会编

《水浒研究与欣赏》第四辑编辑人员名单

主 编 马成生

副主编 徐柏松 朱睦卿

编委(以姓氏笔划为序):

马成生 朱更新 朱睦卿

李建平 邹志勋 周新法

徐柏松



浙江《水浒》研究会 第五届理事及分工名单

一、理事(以姓氏笔划为序):

马成生 方 才 王明煊 卢 忻 叶九如

吕立汉 许李平 应守岩 朱睦卿 吴光松

陈崇清 余锦根 余德余 季学原 赵明政

徐柏松 屠子根 黄岳杰 虞卓娅

二、会 长 马成生

副 会 长 余锦根 徐柏松 屠子根

秘书长 卢 炘

副秘书长 黄岳杰

開展水滸研究
弘揚民族文化

吳兆書



前 言

经过几年的努力,《水浒研究与欣赏》(第四集)终于脱稿付印了。

这本集子,分一、二两部分,分别由建德市水浒研究会与浙江水浒研究会组稿。前者 and 淳安县青溪水浒研究会一样,都曾准备作为后者的分支机构,只是为了某些原因而未果,不过相互之间,常有联系,关系密切。这次付印的集子,就由这两个研究会中的有关参与者组成编委会,仍是署为浙江水浒研究会编。全书共有文章二十四篇,另加来信两则。

第一部分,以讨论《水浒》中的“征方腊”为中心,第二部分也对此作了些呼应。这些文章,比起十年前在建德白沙镇举行的讨论会来,自然是有所进展,如“征方腊”的性质、意义等,观点等就更为鲜明,而且,在艺术特色方面也作了些分析。但总的看来,还很不够,今后还须不断努力。除了有关“征方腊”的文章,还有对《水浒》的作者、成书过程、主题思想以及某些人物形象等作了探讨。另还将学术成果地方化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研究。这就使这本集子不仅具有理论探索上的意义,更有“实际操作”方面的意义。

在时下学术研究步履艰难的情况下,我们这本小集子之

所以能够顺利问世,并且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,首先要感谢建德市人民政府、建德市政协的大力支持;同时我们还得到了建德市风景旅游管理局、建德林场、建德市农机总公司、建德市严东关酒厂、杭州江南艺术品经营公司总经理周岳平先生等的援助,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编 者

1995年11月

目 录

—

睦州分会论文选辑

- 从宋江征方腊谈起…………… 王国光(1)
- 忠义英雄史诗的完成
- 《水浒传》“征方腊”的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 王 基(8)
- 睦州二论——《水浒》“征方腊”漫议…………… 钱茂竹(27)
- 浅论“招安”之类…………… 刘黎明(39)
- 试论《水浒》人物性格组合的若干结构类型…………… 吕莉芳(43)
- 试论《大战乌龙岭》的情节特色…………… 洪淳生(57)
- 从《水浒》的方言俗语探索作者的行踪…………… 齐 健(62)
- 建设《水浒》旅游区 开发《水浒》旅游线…………… 朱睦卿(72)
- 利用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开发建设“水浒·睦州之战馆”
- 兼谈《水浒》研究为振兴经济服务,并深化《水浒》研究…………… 方长才(78)

二

省水浒传研究会近期论文选辑

愿一佑明主 功成还旧林

- 中国古代文人心态特征和《水浒》的创作主旨……………
- …………… 惠养德(87)
- 试论《水浒》中的爱国主义意识…………… 俞世芬(99)

邪气所生的梁山好汉·····	张唯凡(109)
宋江形象及其创作艺术的再认识·····	王延荣(115)
略论金圣叹对宋江形象的删改·····	柯 军(135)
短论两则·····	张振萍(145)
“放弃斗争”重提——从许贯忠形象谈起·····	汪吾金(153)
多样统一的整体——浅析《水浒传》的和谐美 ·····	彭丽萍(161)
不垂泪处亦催泪——《水浒》的情感描写赏析 ·····	金功发(172)
试论《水浒》中的骂人话·····	雷 斌(180)
《水浒》中的“望子”·····	王金法(186)
茶文化与明清小说·····	季学原(198)
《水浒》“宋江征方腊”是大明兵打张土诚的历史移植 ·····	洪长寿 陈志庆 团之(200)
方腊籍贯释疑与帮源地名考订 ·····	方 才 洪长寿 余锦根(215)
为方腊起义遗迹“帮源洞”洞址辨位的说明 ·····	方 才 洪长寿 余锦根(234)
来信两则·····	苏小罗 暴中文(236)

从宋江征方腊谈起

王国光

不知谁氏何年杜撰了宋江征方腊的故事，令我辈在童蒙时代就从大人的闲谈中略知一二。由于生为睦州人，故事又发生在睦州一带，这就使人倍感亲切。尽管小孩略碰一碰也会大哭大叫，却又喜欢听打打杀杀的故事，颇觉好玩。告别了好奇的年龄，又学了一点理论，偶尔谈起宋江征方腊，反而产生了困惑：宋江作为农民起义者，受了招安，又反过来打方腊这个农民起义者，这笔帐的正负乘除该怎么算？

我们先来看看《水浒全传》中的方腊：“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，因去溪边净手，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，身穿袞龙袍，以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”。由愚昧而产生野心的事例，在历史上不胜枚举。或因相貌五岳朝天，被许为贵不可言；或因生辰四库全备，生定作九五之尊；或因祖坟墓在天子山，一定出真命天子……也有各式各样的野心家，利用群众的愚昧心理，造作谣言，为实现他的野心而服务。杀戮生灵，破坏生产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

方腊有幸打下了江南半壁，“方腊自为国王，独霸一方”，“仍设文武职台，省院官僚，内相外将，一应大臣”。也忘不了把人阉为太监，作为他的奴才；更忘不了收罗嫔妃彩女，供其淫乐。俗语云：吃了山溪水，便变野猪精。方腊有刀便是草头王，一旦权力在手，也就胡作非为“行不仁之事”。陈胜曾说：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起事后果然做了张楚王；贫贱时，他对同伴说：“苟富贵，毋相忘”，富贵后，他的同伴却成了他的刀下之鬼。张角讲：“苍天已

死，黄天当立”，颇有项羽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意思。刘邦见秦皇出巡，也说：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。他们头脑里想的都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。

作者说：“因朱勔在吴中征取花石纲，百姓大怨，人人思乱，方腊乘机造反”。按理，方腊造反后对这方面应有所顾忌。然而方腊“就清溪县内帮源峒中起造宝殿、内苑、宫阙。睦州、歙州亦各有行宫”。这些“龙楼凤阁，内苑深宫，珠轩翠屋”，劳民伤财，给百姓带来的祸害，比之花石纲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真是一蟹不如一蟹。

方腊封方貌为御弟三大王，镇守苏州；封方天定为太子南安王，坐镇杭州；封方垕为皇叔大王，总管歙州；又封皇侄方杰为殿前金吾上将军，保守清溪大本营。真可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方氏王朝，其落后的封建宗法性，比赵宋王朝还稍进一等。此外，保守润州城的吕师囊：“此人原是歙州富户，因献钱粮与方腊，官封为东厅枢密使”；扬州城外陈庄主献粮，就“封做扬州府尹”，方腊的政权还是农民政权么？

昱岭关老和尚对时迁说：“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，无一个不怨恨他……今日幸得天兵到此，万民有福。将军来收此贼，与民除害”。于是给时迁指引了一条小路，里应外合攻破了昱岭关。宋江大战乌龙岭，折了阮小二、孟康、解珍、解宝之后，一时无计可施，找到睦州城外一位老汉。他说：“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，累被方腊残害，无处逃躲。幸得天兵到此，万民有福，再见太平。老汉指引一条小路过乌龙岭去”。宋江就是由这条小路越乌龙岭，克睦州城直捣清溪大本营的。民心的向背，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。《宋史》载方腊“戕平民二百万”，可能有些夸大之处，但不会全无事实。

宋江攻打杭州时，截获一批粮船，船主反映：“我等皆是大宋

良民，累被方腊不时科敛，但有不从者，全家杀害……近奉方天定令旨，行下各县，要刷洗村坊，着科敛白粮五万石。老汉为头，敛得五千石，先解来交纳。”民以食为天，如此科敛，又要将不从者全家杀害，怎不失道寡助呢？

宋江攻常州时，“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，怨气冲天。听得宋军入城，尽出来助战”。方腊的将领赵毅，“躲在百姓人家，被百姓捉来献出。”宋江占领睦州时，方腊的败将逃亡，“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贵、谢福，解送献入睦州”。清溪最后一战时，一位老僧又引领鲁智深生擒了方腊本人。作者写了宋江的得道多助。

方腊升殿时，“内列着侍御嫔妃彩女，外列九卿四相，文武两班，殿前武士，金瓜长随侍从”。方腊对文武大臣讲：“汝等众卿，各受官爵，同占州郡城池，共享富贵”。可见《水浒》中的方腊，原本怀抱野心，趁机起义，起义后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，仍旧少数人享富贵，奴役广大人民。这使我想起了《史记》中的一句话：“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！”以暴易暴的代价却是田园荒芜，白骨遍野。

从历史上讲，宋江征方腊并无依据，方腊造反史实，也不尽如故事所述。然而在封建社会里，或因统治者政策失误，官吏贪暴无度；或因天灾连年，哀鸿遍野；或因野心家造谣惑众，希图富贵，以至动乱频频。起义者或失败，或受招安，也有受招安后又去打另一伙起义者的，即使起义成功了，也必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，刘邦、朱元璋即是例证。所以从典型意义上讲，宋江征方腊故事，符合艺术真实的要求。有文字记载的方腊的劣迹，作者并未都把它们收入故事，可见作者并非有意对方腊进行丑化诬蔑。

对宋江征方腊的评价，牵涉到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。我们知道，人类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阶段性过程之

中。社会的发展也遵循着量变质变的规律，两个质变之中必有一个慢长的量变过程。中国的奴隶社会经历了两千年，封建社会也经历了两千年。所谓量变，主要指生产力的发展，是人们结合在适应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中，对自然的斗争；所谓质变，是指上层建筑的突变。各种上层建筑服务于不同的生产方式。马克思主义指明人类历史上的三次质变：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质变，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质变，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变。在这三次质变中，新兴的奴隶主、封建主、资产者分别代表新的生产方式，进行社会革命，推动了社会质的进步。而作为农民阶段，它是封建社会中发展生产力的主力军，通过发展生产力推动封建社会量的进步。它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，并不是社会革命阶段，不可能进行社会革命，不可能创建新的社会形态，古今中外历史上，绝无通过农民革命推动社会质的进步的事例。

马克思说得好：“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，发生一定的、必然的、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，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”。要发展生产力，就必须要结合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中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否则无法生产，社会破坏，人类灭绝。说白了，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，有一个封建社会量变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农民阶级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，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阶段，必然性表现出现实性，如黑格尔说：“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”，也就是讲这种剥削压迫在当时是合理的，其合理性可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论证。正相反，在当时反对这种剥削压迫反而是不合理的，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而是历史唯心主义者。

产生《水浒》的宋元时代，距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十分遥远，是处于一个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量变时期，人与自然的斗争即生产斗争推动着社会的进步。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

人民的安居乐业,社会安定是十分重要的,当时人们最强烈的愿望是天下太平。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,是社会量变时期不可分离的两大主题,安定是发展的基础,发展又促进安定。宋元时代,为了要达到天下太平,主要要做三件事:对外抗击外侮,对内平定内乱,并要惩办贪官奸佞使民得以聊生。《水浒》前七十一回,写宋江等反贪官奸佞;七十一回之后,写宋江等受招安征辽以抗外侮、征方腊以平内乱,都符合当时社会安定的要求。若按当时的观念,征辽是忠、惩方腊也是忠,反贪官奸佞还是忠。《水浒》结束时,作者说:“不须出处求真迹,却喜忠良作话头”,实在是画龙点睛之笔。此外,有些梁山好汉除暴安良,济困扶危,义气深重,也基本上符合促进社会客观要求的。所以《水浒》是符合当时社会客观要求的,以忠为主,以义为辅的《忠义水浒传》。

到了明代中叶以后,由于作为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,作为资产者前身的市民阶层的成长,作为资产者民主革命思想的前奏的启蒙思潮的涌动,时代要求对封建社会逐步作了批判。明末文坛出了一位怪杰金圣叹,他大笔一挥腰斩了《水浒》,他斩去了攘外安内部分,斥之为恶札。留下了前七十一回,作了修改,并加上“乱自上作”的评语,使全书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反贪官奸佞和除暴安良上,客观上已经把一部宣扬忠义的书,改造成为批判封建贪暴的书。七十回本的《水浒传》,就没有人称之为《忠义水浒传》了。七十回本首版的第二年,统治者开始用行政手段查禁《水浒》了。近代当代一些认为《水浒》是反封建之作的论者,也往往着眼于前七十一回,虽未标明腰斩,实际上也是一种腰斩。鲁迅可惜七十回本成了断尾巴蜻蜓。我倒另有一比,比如斩掉一端的哑铃,变成一柄打击封建贪暴的榔头。读者诸君不知以为然否?

在社会处于量变阶段,社会安定是十分重要的。肉食者谋,统治者应该调和各阶级的利益,使弱者得以生存,强者得以发展,对外能抗击外侮,对内能惩办贪暴,保持社会的安定、保障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。比宋江方腊略早一点的王安石就是想这样做的;他主持编制了国家预算,压缩国家开支的百分之四十,调和了国家与人民的矛盾。他又实行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,把原来穷人的部分负担转移到富人头上去,调和了贫富之间的矛盾。他实行了农田水利法,促进农业生产。实行了置将法、军器监法,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。王安石变法,一时呈现了祥和景象。

社会发展自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程,社会发展诸形态都是不可逾越的。宋元时代,是封建社会的量变时代,封建制是不会灭亡的,也不可能“等贵贱、均贫富”的,当时社会需要的是免役、均税之类好的社会政策,而不是妄图推翻封建制度的造反。当时这种造反,给社会带来的只能是悲剧:人民流离失所,生产停滞破坏,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。至于悲剧的起因,应根据史实进行具体分析,大多数情况下,由于肉食者鄙,人民无奈而造反,酿成悲剧的罪责就在于统治者了。假如没有花石纲之类的害民举措,也许不会有方腊造反的悲剧,当年的统治者是难辞其咎的。

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必经阶段,只有等到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发展到足够强大时,才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,过渡到高一级的社会形态,建立市场经济主导和民主上层建筑,才能从封建社会的恶梦中摆脱出来。不过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,至今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进步的过程之中;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前进了一步,封建社会又比奴隶社会提高了一步,资本主义社会又比封建专制主义好得多,尽管它还有一些缺陷。正象没有终极真理

一样,永远也不会有完美的社会。恩格斯说:“完美的社会,完美的国家,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。反之,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,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”。人类只能积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,循序渐进。超越时代要求的道德价值、良好愿望,只能铺成通向地狱的道路,因此我们对于水泊梁山的平均主义的“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”不应作正面的评价。说到底,水泊梁山的乌托邦,实在是最坏的一种乌托邦,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之上,而是建立在打家劫舍的基础之上,颇有强盗乌托邦之嫌。

由于人们的着眼点不同,四百年来的《水浒》评论众说纷纭。着眼于梁山好汉以武犯禁,故斥之为“海盗”;着眼于攘外安内,故誉之为“忠义”。忠义诚忠义矣,与纯然忠义者有差;盗亦盗矣,与纯然为盗者有别。近代西风东渐,赞其自由者欲纳之于民主主义;赏其平均者又欲纳之于社会主义。时代不同,张冠岂可李戴?当代矛盾之说盛行,关键是着眼于阶级斗争,言农民与地主矛盾者有之;着眼于反贪官不反皇帝,论革新派与保守派矛盾者有之;着眼于为市井细民写心,讲市民与政府矛盾者有之;差眼于写一批江湖豪杰,直说江湖豪杰与朝廷矛盾者也有之……矛盾普遍存在,《水浒》既描写了当时社会的广阔画局,自然表现了千百种的矛盾,见智见仁,各从所好,合而论之,庶几近似。然全书则以忠义为主,七十回本则偏于反封建矣,未可一概而论。

1994.12

忠义英雄史诗的完成

——《水浒传》“征方腊的”几个问题

王 基

—

《水浒》故事发生的时代及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，人们的思想观念，整个的是一个封建的意识形态。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，农民的皇权思想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。

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阐释各种历史文化现象，但是不能让历史适应我们的某种观念，使之成为游离于其时代之外的一种外加的文化观念。因为，我们是站在我们的时代去返观历史，自然地带有我们时代的烙印，虽然，研究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的，但是这种服务却不是简单的比附、影射，更不能以古作今，将不同时代不同质的事物强加上一个等号，然后一厢情愿地去做我们想做的文章，说我们想说的话。《水浒》研究工作中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种倾向。相当多的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评判阐释《水浒》，却又恰好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，只是牵强附会地套用某些概念术语，削足适履地让古人古事任凭他们解释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，对历史和文学的解释必然走入误区。

摆在研究者面前亟待阐释清楚的问题是《水浒传》的性质，或者说它的主题应当怎样界定。在诸多的争论中，“农民起义说”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。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取得的重要成果，多少年来学术界都是这样评价的。近年来对这一主张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因为按照“农民起义说”作品中的许多问题

解释不了,同时又衍生出了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。诸如有人提出梁山泊起义根本不是农民起义,不能简单地运用农民革命、农民战争来概括它;如果将这场起义视为农民革命,就又必须说明应该怎样写农民起义,是只能写革命,不能写投降呢,还是二者可以兼容,等等。其实,这些是当代作家写农民起义才需要考虑和回答的问题。姚雪垠、蒋和森关于唐末、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小说是需要这样讨论的,如果研究《水浒传》提出这样的问题,似乎有点太超前了。这些论者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:任何人都无法遗世而立。所有的杰出的人物都只可能在他们的特定的时空中生活。《水浒传》的作者,不管具有多么先进的思想观念(很多学者已指出,他的妇女观就是比较落后的),也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却都只能是封建社会中的雄杰。他(们)只能站在他(们)所能拥有的时空中高屋建瓴地看社会看人生,编织建构属于他(们)的时空故事、人物和艺术殿堂。

这是因为人们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。这种特定的文化环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。这样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意识的形成、表达与辨识,都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它是人在历史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规范、习俗,也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媒介。共同的文化背景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共同的东西,也可理解为同一文化环境中共同的规范。文学作品的客观性,便是由文化背景上的共同规范来保证的,它们规范着共同的心理、理解,提供着阐释分析的依据。

因此,《水浒传》里的人物,活动的天地是他们特有的时空,他们的思想、情绪、理想、追求无不属于他们所属的时空;《水浒传》的作者也只能在自己所属的时空中去感受他要写的人物事件,有时难免理想化一点,但总体是不能亦无法超越其时空的。虽然《水浒》故事中的人物,同作者并不同时生活于同一时空,但